

东晋南朝墓葬出土道教符文牌（砖）初探

左凯文 王志高¹

（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江苏南京 210024）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早期道教文献资料可知，南京、两广地区东晋至南朝墓葬中所出符文牌（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道教真文关系密切。这些符文牌（砖）在墓中有禳煞镇墓之用，很可能是从两汉“五石”镇墓到唐代“五方镇墓真文”镇墓方式的过渡。结合墓葬年代等信息，推测在墓葬中放置道教符文牌（砖）这一葬俗，应是由当时都城建康向两广地区传播。

【关键词】：符文牌（砖） 真文 镇墓 道教 东晋南朝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南京和两广地区4座东晋晚期至南朝墓葬中发现多块符文牌（砖）。相关资料的发掘与整理者皆认为这些符文牌（砖）应当与道教有关^[1]，但此后鲜见学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即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六朝符文牌（砖）相关问题的关注。

一、出土符文牌（砖）概况

依据目前公布的资料，南京与两广地区东晋至南朝墓中共出土16块符文牌（砖），以下先对相关资料进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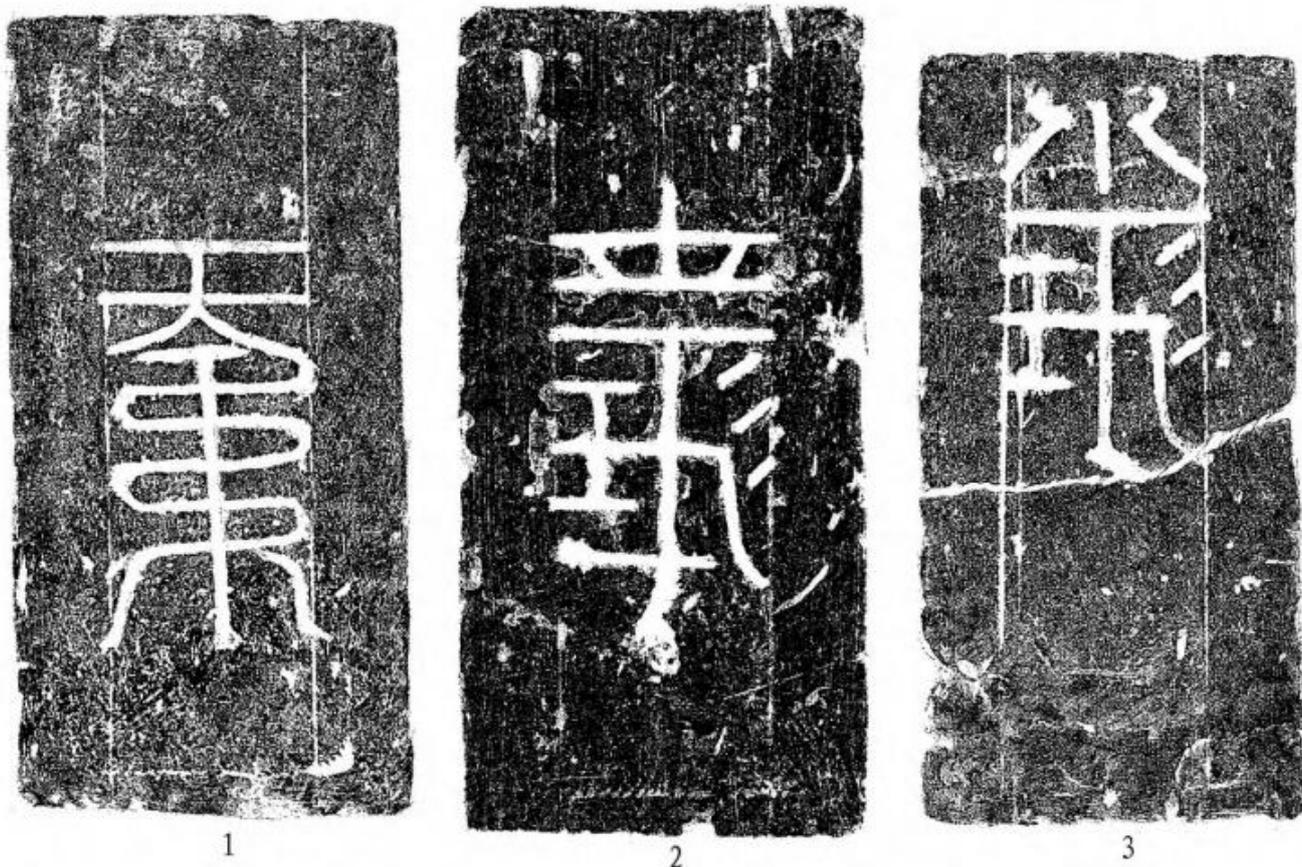
南京地区共发现5块符文砖，皆出于南京宁丹路M10^[2]。该墓是一座平面呈“凸”字形的砖室墓，由墓道、排水沟、封门墙、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甬道中部设有一道木门，墓室设砖砌祭台、棺床等设施。发掘者依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定该墓相对年代为东晋晚期至南朝早期。墓中所出符文砖皆为长方形青灰砖，正面为符文，阴刻，字形规整，笔画内有朱砂痕迹，符文外侧刻划有长方形边框；背面模印三组钱纹放射线纹。其中3块保存较好，出土位置及相关数据如下。

宁丹路M10：13，出于墓室西南角。一面刻划有符文，符文长14厘米。砖长27.2~27.4、宽13.4~13.5、厚2.7~3厘米（图一：1）。

¹ 收稿日期 2022-05-07

作者简介 左凯文（1994—），男，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六朝考古。

王志高（1968—），男，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六朝考古。



图一// 南京宁丹路M10出土部分符文砖拓片

1.M10:13 2.M10:28 3.M10:35

(采自《南京市雨花台区宁丹路东晋墓发掘简报》，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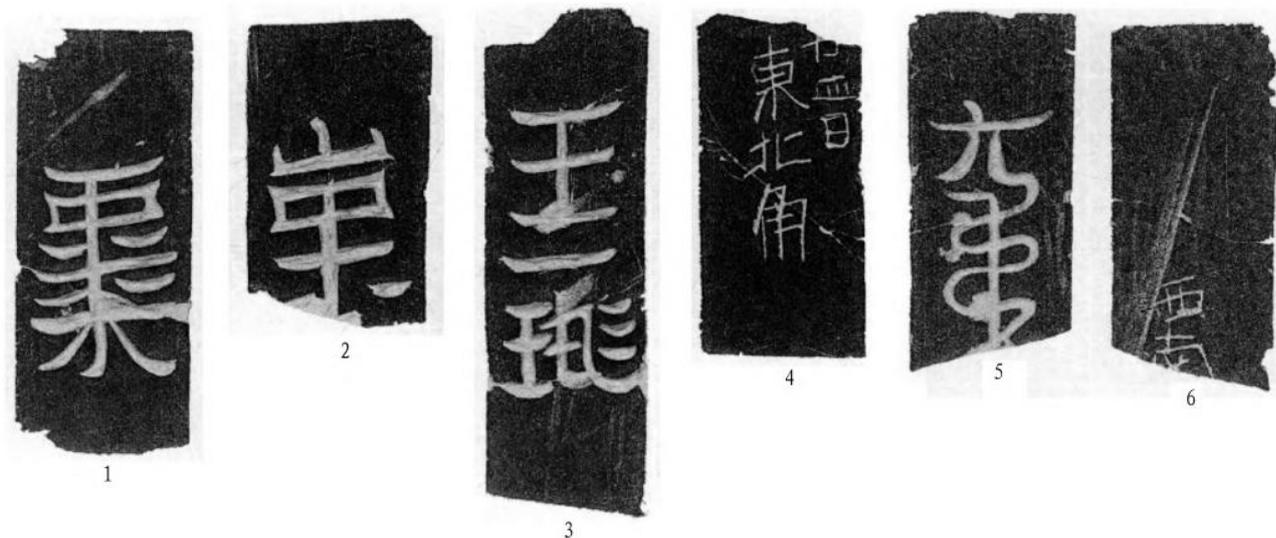
宁丹路M10:28, 出于墓室西北角。一面刻划有符文, 符文长14.8厘米。砖长27.2~27.4、宽13.2~13.3、厚2.9~3.1厘米(图一:2)。

宁丹路M10:35, 出于墓室中部的祭台之下。一面刻划有符文, 符文长13厘米。砖长26.4~26.8、宽12.9~13、厚2.9~3.2厘米(图一:3)。

两广地区共发现11块符文牌, 其中5块出自广东, 皆发现于广州淘金东路中星小学M69刘宋龚韬墓(以下简称“广州中星小学M69”)^[3];6块出土于广西柳州融安南朝墓^[4], 其中4块出于融安M8,2块出于融安M10。

广州中星小学M69为一座平面呈“吕”字形的双室砖墓, 由封门墙、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组成。根据墓中出土的买地券, 可知墓主是刘宋州从事史龚韬。该墓所出符文牌为滑石质, 均残, 正面刻划有符文, 部分背面还刻有方位和日期。相关信息如下。

中星小学M69:5, 出于前室中部, 一面刻划有符文。残长11.3、宽4.1、厚0.9厘米(图二:1)。



图二// 广州中星小学M69出土符文牌拓片

1.M69:5 2.M69:11 3.M69:12 4.M69:21 5.M69:23正面 6.M69:23背面

(采自《广州市淘金东路中星小学南朝墓发掘报告》,第133—146页,图八)

中星小学 M69 : 11, 出于前室西北角, 一面刻划有符文。残长 8、宽 4.2、厚 1.1 厘米 (图二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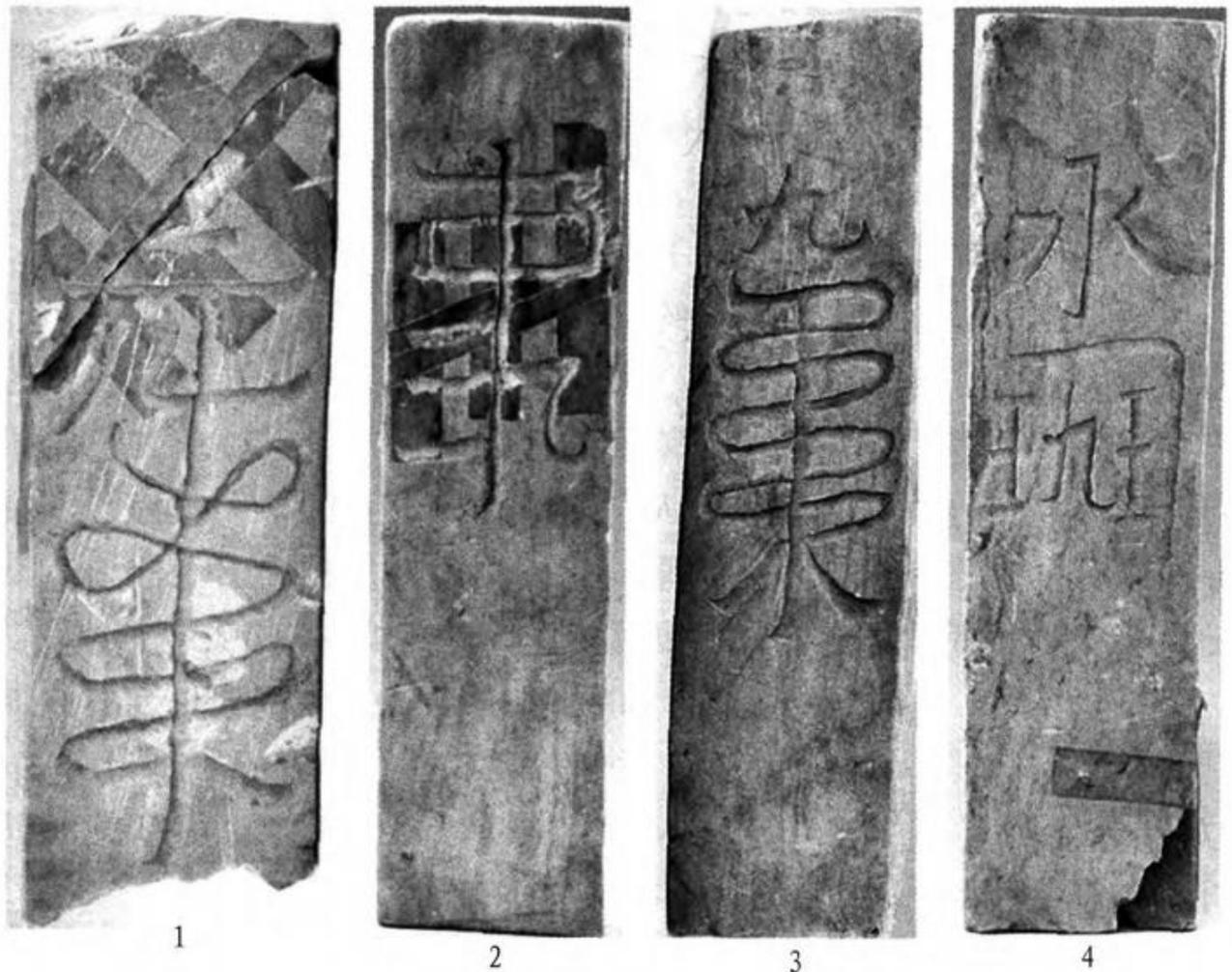
中星小学 M69 : 12, 出于前室西北角, 一面刻划有符文。残长 13.4、宽 4.2、厚 1.1 厘米 (图二 : 3)。

中星小学 M69 : 21, 出于墓室西北角、过道前段, 一面阴刻“廿二日”“东北角”六字, 另一面简报未说明有无符文。残长 9、宽 4.2、厚 1.1 厘米 (图二 : 4)。

中星小学 M69 : 23, 出于墓室西侧, 正面阴刻符文, 背面阴刻“西南口”, 疑为“西南角”。残长 9.6、宽 4.2、厚 0.9 厘米 (图二 : 5、6)。

广西融安 M8 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券顶砖室墓, 墓室长约 6、宽约 2、高约 2 米。该墓所出 4 块符文牌, 皆呈长方形, 滑石质, 正面刻划有符文。由于资料公布不详, 符牌具体出土位置不明。相关信息如下。

融安 M8 : 7, 下端残损, 一面刻划有符文。长 17、宽 5.5、厚 1.2 厘米 (图三 : 1)。



图三// 广西柳州融安M8出土符文牌

1.M8:7 2.M8:8 3.M8:9 4.M8:10

(采自《融安南朝墓出土滑石符牌与道教文化初探》，第349—355页，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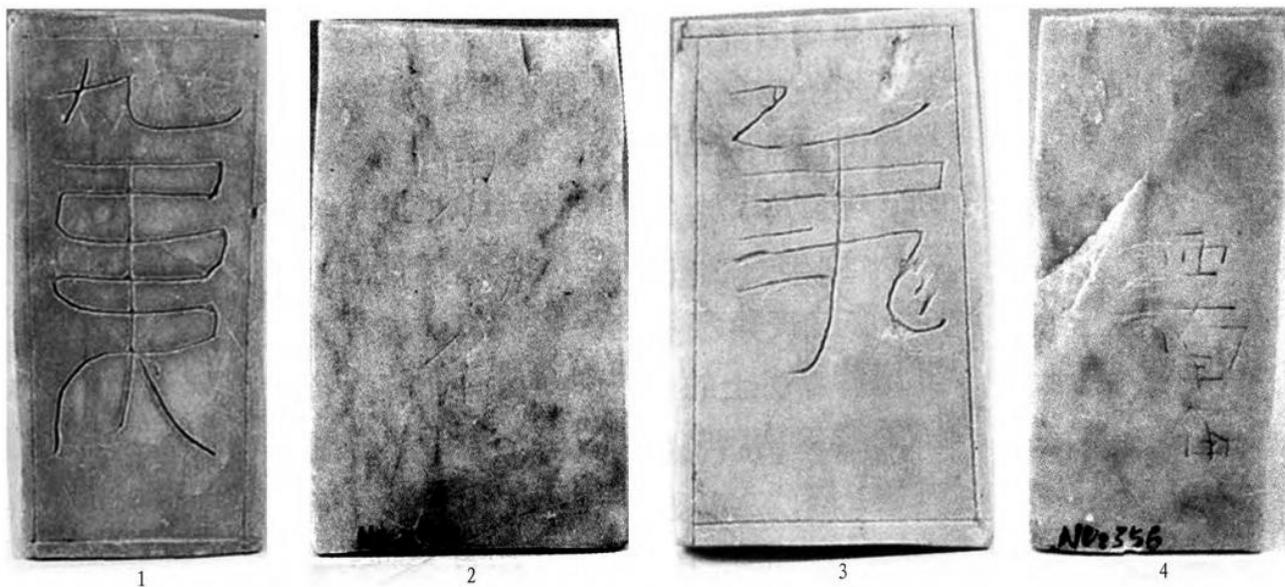
融安M8:8，一面刻划有符文。长22、宽5.6、厚1.3厘米（图三：2）。

融安M8:9，一面刻划有符文。长23.8、宽6.3、厚1.1厘米（图三：3）。

融安M8:10，一面刻划有符文。下端残损，长21.8、宽5.4、厚1.1厘米（图三：4）。

融安M10为一座多室墓，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墓长6.34、宽2.68、高4.23米。由于资料公布不详，符牌具体出土位置亦不明。该墓所出2块符牌相关信息如下。

融安M10:3，正面刻划有符文，符文外有边框，背面刻有“东南角”三字。长7.9、宽4.8、厚1.3厘米（图四：1、2）。



图四// 广西柳州融安M10出土符文牌

1.M10:3正面 2.M10:3背面 3.M10:4正面 4.M10:4背面

(采自《融安南朝墓出土滑石符牌与道教文化初探》,第349—355页,图5—8)

融安M10:4, 正面刻划有符文, 符文外有边框, 背面刻有“西南角”三字。长8.8、宽4、厚0.7厘米(图四:3、4)^[5]。

二、出土符文释读及其所属体系分析

广州中星小学M69所出买地券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故发掘者认为墓主龚韬是一位“信奉道教的官吏”, 由此进一步推测该墓及南京、柳州融安等地东晋南朝墓葬中出土的符文牌(砖)当与道教有关^[6]。

那么南京、广州、柳州融安三地四座六朝墓葬所出符文该如何解读呢? 通过比对, 笔者认为上述符文有以下三点共同特征。

其一, 这些符文都由上下两部分构成。

其二, 符文的上部为汉字。这些汉字又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自然事物, 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 如南京宁丹路M10:13、融安M8:7和广州中星小学M69:23符文上部汉字为“天”, 融安M8:8与广州中星小学M69:11符文上部汉字为“山”, 南京宁丹路M10:35与融安M8:10符文上部汉字为“水”, 南京宁丹路M10:28符文上部汉字似是“山”“土”两字重叠; 第二类为数字, 如广州中星小学M69:5符文上部汉字为“一”, 融安M8:9和融安M10:3符文上部汉字为“九”; 第三类为天干, 目前仅发现一例, 融安M10:4符文上部汉字为“乙”; 第四类为人物, 目前亦仅一例, 广州中星小学M69:12符文上部汉字为“王”。

其三, 符文的下部为抽象符号。这些符号笔画圆润, 有篆书的风格, 总体可分为四种(表一)。进一步观察, 笔者发现每种符号与符文上部汉字的组合以及符文牌(砖)在墓葬中的摆放方位有一定规律: A种符号常与第一类和第二类汉字组合, 常被放置于墓室的东南角或西南角; B种符号常与第一和第四类汉字组合, 放置在墓室的西北角和中部; C类符号与第一类和第三类汉字组合, 放置于墓室西南角; D类符号与第二类汉字组合, 所处位置不明。

表一//符文上部汉字与下部符号组合统计表

符文下部	第一类汉字	第二类汉字	第三类汉字	第四类汉字	符文牌(砖)
符号	(自然事物)	(数字)	(天干)	(人物)	放置位置
 A	南京宁丹路 M10:13 融安 M8:7 广州中星小学 M69:23	融安 M8:9 融安 M10:3			墓室东南角 或西南角
 B ^[7]	南京宁丹路 M10:28 南京宁丹路 M10:35 融安 M8:10			广州中星小学 M69:12	墓室西北角 或中部
 C	融安 M8:8 广州中星小学 M69:11		融安 M10:4		墓室西南角
 D		广州中星小学 M69:5			不详

南京和两广地区东晋、南朝墓中发现的这些符文具有相同的特征，但发现地之间距离遥远，故推测道士在为丧家制作符文牌（砖）时，当依凭相同文本。可见这些符文在当时相当成熟，已成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的道教符文体系大致有“复文”“灵宝五符”“三皇文”“真文”等^[8]。南京等地墓葬中发现的符文与这些符文体系是否有关？

“复文”一般被认为可能是最早的符字，主要收录于《太平经》之中。据《太平经复文序》载，复文“凡四部，九十五章，二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二章是干君从本文中演出，并行于世，以复相辅成教而传受焉，故不谬也”^[9]。观察复文的构造，可以发现它们皆由多个隶书汉字重叠拼合而成。王育成认为，复文通过不同汉字的重复组合，以最终达到书符者的目的^[10]。反观南京等地东晋、南朝墓葬所出符文，其构造并非隶书文字的简单组合，与《太平经》复文差异颇大，故应与这一符文体系无关。

“灵宝五符”出现在东汉末年，主要收录于《太上灵宝五符序》^[11]。“灵宝五符”近似篆书，又略具虫书鸟迹之态，且多是由若干个符文合写，以一个整体的道符形式出现。此与南京等地东晋、南朝墓葬所出符文差异较大，故亦非同一体系。

“三皇文”是书写《三皇经》的符字。《三皇经》又称《三皇内文》《神洞三皇经》或《三皇文》，是魏晋时道教的重要经典。关于“三皇文”，宋人张君房在《云笈七签》卷六《三皇文序目》有一段形象的记载：“（三皇文）字似符文，又似篆

文，又似古书^[12]。”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三皇文已经失传，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在南宋宁全真口授、林灵真编撰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中觅得《三皇经》本文^[13]。三皇文的抄本目前最早见于宋代，在未见到更早版本之前，笔者认为不能贸然将出土符文与之进行比较。

除了上述三类符文，魏晋道教徒中流行的符文尚有“真文”。“真文”是从灵宝五符与三皇文演化而来的一种与篆书相仿的特殊文字，又称秘篆文、云篆、天文、神篆、秘文等^[14]。早期道教文献《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等经书中收录了大量这类符字，并在其旁注有“右十六字秘篆文”“右四十字秘篆文”等说明文字^[15]。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依据相关学者的研究，真文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到南朝时已趋于规模化^[16]，这与南京、两广地区出土符文的墓葬时代大体相合；其次，真文主要有两种形式，既可由多字组成一符，亦能以单字的形式出现^[17]，而目前出土的相关符文即以独立的符号出现；再次，通过对早期道教典籍中的真文进行分析，笔者发现部分真文的结构与出土符文近似，即上下结构，上部类似楷书，甚至有个别真文（图五）与南京宁丹路M10：13、广州中星小学M69：23、融安M10：3几乎一致；最后，此前已知真文主要见于唐宋墓葬出土的五帝（青帝、白帝、黑帝、赤帝、黄帝）或五方（东方、西方、北方、南方、中方）镇墓石上^[18]，这又与南京等地六朝墓葬出土符文的情况相近。



图五// 与南京宁丹路M10:13等符文类似的道教真文

(1. 采自《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上,第779页;2. 采自南朝宋·陆修静编撰:《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道藏》第6册,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第566页。)

综上所述，南京等地六朝墓葬发现的符文与道教真文的流行时代相同、使用和构造接近。虽然其数量有限，尚不能确定是否属于同一体系，但推测它们之间应当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三、符文在墓葬中的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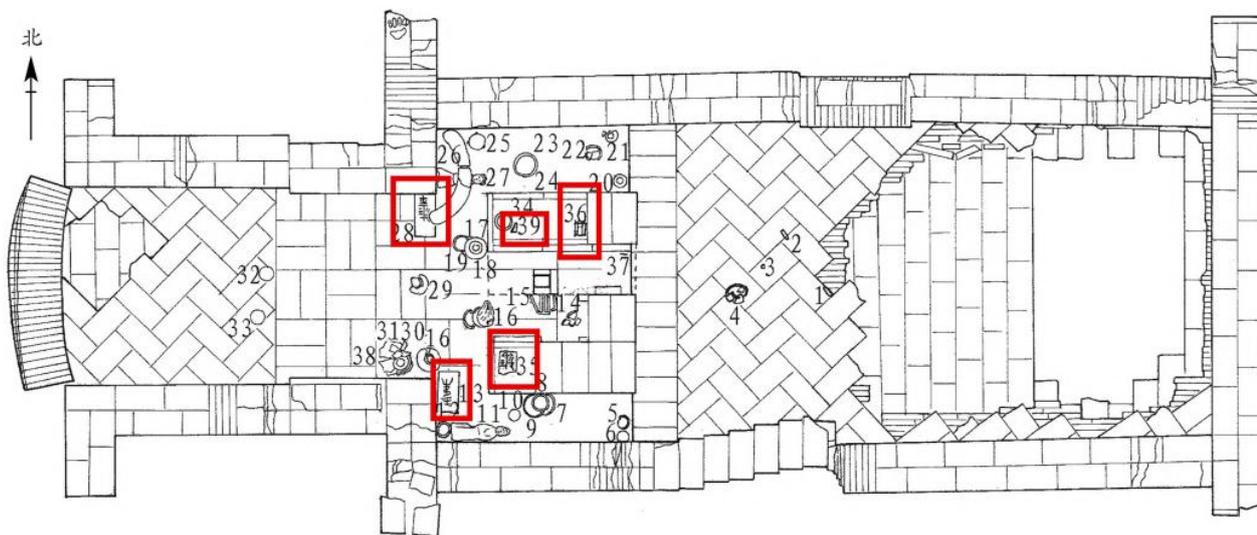
现在的问题是：南京、广州、柳州融安等地六朝墓葬中放置符文的作用何在？

早前有学者利用广西地区流传的宗教神秘图书，结合当地“道士”的口碑资料，认为柳州融安M8出土的符文代表月份及墓

主的性别：其中融安 M8：7、融安 M8：8 和融安 M8：9 分别是“二月符”“四月符”和“九月符”，而融安 M8：10 墓主人为女性，用于“关照冥府，炼度亡魂”^[19]。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种观点疑点颇多：一方面，融安 M8：9 上部汉字为“九”，将其释为“九月”尚可理解，但是融安 M8：7 和融安 M8：8 上部汉字分别为“天”“山”，将它们释为所谓“二月”和“四月”则毫无根据；另一方面，即便将相关符文视为代表月份的符篆，那么它们在墓中的作用令人难以理解。如所周知，六朝墓葬见有放置买地券或卖地券以表明墓主身份、性别，但未见使用道教符文来达到类似目的之墓例。

笔者认为，分析符文牌（砖）在墓葬中的作用，还是应当从它们的出土位置等考古信息入手。

发现符文牌（砖）的 4 座东晋、南朝墓葬均遭盗扰。相较而言，南京宁丹路 M10 扰乱程度较小，符文砖分别出土于墓室西南角、西北角和祭台下（图六），而广州中星小学 M69 和融安 M10 所出部分符文牌背面写有“东南角”“西南角”“东北角”，南京宁丹路 M10 和广州中星小学 M69 发现的符文牌（砖）皆有 5 块，可见完整的符文牌（砖）应当为 5 块，分别放置于墓室的五方（四角和中央）。



图六// 南京宁丹路 M10 符文砖出土位置示意图
(采自《南京市雨花台区宁丹路东晋墓发掘简报》，图十二)

前文已经分析，南京、两广地区墓葬所出符文与南朝时期流行的道教真文关系紧密。耐人寻味的是，依据相关文献和出土文物可知，六朝隋唐时期流行将真文撰写的道经《灵宝五篇真文》放置于阳宅或阴宅的五方，以达到驱邪禳煞、安宅镇墓的作用。

《灵宝五篇真文》是道教灵宝经的核心内容之一，共有五篇。依照《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其篇名分别为：《东方青帝灵宝赤书玉篇》《南方赤帝灵宝赤书玉篇》《中央黄帝灵宝赤书玉篇》《西方白帝灵宝赤书玉篇》及《北方黑帝灵宝赤书玉篇》^[20]。每篇经文又分为四段，不同段落的作用可分为召天神、召星官、摄魔鬼和召水神四种^[21]。东晋时期成书的《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以下简称“《赤书玉诀》”）专门用于解说《灵宝五篇真文》，其中有不少利用真文压胜的具体方法，以下试举一例。该经卷上《东方九炁青天真文赤书玉诀》载：

岁星辅肝，角亢镇真，氐房心尾，四景迴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轮，承炁捕非，扫除灾群。

其三十二字主召天宿星官，正天分度。诸以天灾，星宿越错，朱书三十二字于青纸上，露于中庭九日九夜，夕夕依法别咒，以火焚，散灰于青烟之中。并刻书三十二字于青石上，埋东方，天灾自消，星宿复位。^[22]

关于上述文字，前一段是对真文版《东方青帝灵宝赤书玉篇》相关文字的释读，后一段则是对相关符文用法的说明。从中可知，道士不但需要焚烧写有真文的纸张，还需要将真文刻在石头上，埋于固定的方位，从而达到消灾避祸的目的。

《赤书玉诀》还详细说明了利用真文安宅的方法：

道士学至道上法，修奉斋戒，精思念道，上希灵真，灭魔却试，皆当先按灵宝上元旧格，施案真文，镇于方面。灵真降室，五帝官属侍卫门户，鬼魔消灭，所向咸从。赤书青帝真文于青绡上，置室东壁。赤书赤帝真文绛绡上，置南壁。赤书^[23]黄帝真文黄绡上，置中央。赤书白帝真文白绡上，置西壁。赤书黑帝真文黑绡上，置北壁。施案五篇于斋堂之中，朝暮烧香，随方礼拜，不得杂俗异人干入堂内。此皆方方各有威神、玉童玉女侍卫，犯之奏罪九天，冥考立加，奉者明慎禁忌。^[24]

据此可知，施法者首先需要“赤书”，即用红色材料在青、绛、黄、白及黑色的丝织物上写下真文道经，再将不同内容的道经放置在屋舍的四壁及中央，从而达到召唤各路神明镇宅禳煞的目的。

再从考古发现来看，陕西、河南两省的唐墓中出土有道教五方真文镇墓石（图七）。这种镇墓石“完整者一套五件，分东、南、西、北、中五合，与当时墓志的形制相当，皆由盖和底石两部分组成。……五方真文镇墓石上多刻有东、南、西、北、中之一的大字真文或与之相配的小字楷书敕告文”^[25]，则真文确实可用于镇墓。



图七// 道教北方真文镇墓石拓片

(采自《〈唐故普康公主墓志铭〉与道教五方真文镇墓石》，图3)

综上所述，南京等地六朝墓出土的符文牌（砖）与真文在安宅与镇墓的使用上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上引文献中反复强调道士在施法时需要“朱书”或“赤书”真文，而南京宁丹路M10所出符文砖的笔画内有朱砂痕迹，推测符文原应涂朱；另一方面，南京等地出土的符文牌（砖）放置在墓室四角及中部，而真文亦要求放置在屋宅及墓葬东、西、南、北、中五方，以达到安宅与镇墓的作用。因此，笔者推测南京等地六朝墓葬中出土的符文牌（砖）应做镇墓之用，符文中的“天”“山”“水”等文字或许是施法者所召唤护佑墓主的各路神祇。

四、余论

一般认为，东汉墓葬中通过放置丹砂、雄黄、曾青、慈石、礬石，即“镇墓五石”，以达到镇墓的作用。至唐代，镇墓五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五方真文镇墓石^[26]。从形制和功能来看，东晋南朝墓葬中的符文砖与滑石牌已初具五方真文镇墓石的雏形，颇疑是东汉“镇墓五石”与唐代“五方真文镇墓石”之间的过渡物。由于考古资料的局限及文献资料的匮乏，南京等地六

朝墓出土符文牌（砖）上的符文的含义、与墓室四方具体的对应关系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就目前发现来看，出于墓室西南角的南京宁丹路 M10：13 与自铭“西南角”的广州中星小学 M69：23 符文内容相同，符文上部汉字为“天”，下部为 A 种符号。但是融安 M10：4 亦自铭“西南角”，符文上部汉字为“乙”，下部为 C 种符号，与前两者不同。由此可见符文或许并非代表方位，且相同方位所置符文并不固定；4 座墓葬所出符文并非完全相同，推测符文的组合亦非固定不变。此外，广州中星小学 M69：21 符文背面刻有“廿二日”，似乎表示符文与时间有关。总之，符文牌（砖）在墓葬中的使用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符文牌（砖）是具有浓厚道教因素的随葬品，其制作应被各地职业化的道教术士垄断，而这些道士很可能依凭同一种文本，各地同类符文之间的差异应是相关文本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从墓葬时代来看，南京宁丹路 M10 早于广州中星小学 M69 和柳州融安的两座南朝墓；而通过对比南京、广州、柳州所出道教符文砖（牌），明显可见南京宁丹路 M10 所出符文的字形，较之于其他两地更为规整，故可以认为与道教镇墓符文相关的信俗是由当时的都城建康向两广地区传播。

参考文献：

[1] a. 马余健：《融安南朝墓出土滑石符牌与道教文化初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 11 辑），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349—355 页；b.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淘金东路中星小学南朝墓发掘报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 2005 年；c. 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丹路东晋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 年第 6 期。

[2] 同 [1] c。

[3] 同 [1] b。

[4] 同 [1] a。

[5] 同 [1] a。

[6] 同 [1] b。

[7] 需指出的是，融安 M8：10 与广州中星小学 M69：12 符文下部符号似由“一”“王”“九”“三”等汉字拼合而成，与 B 种符号相近，可能与符号在传抄过程中产生变形有关，本文将它们亦归入 B 种。

[8] a. 刘仲宇：《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 年第 1 期；b. 王皓月：《早期道教秘篆文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8 期。

[9] 《太平经复文序》，《道藏》第 24 册，文物出版社等 1988 年，第 598 页。

[10] 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 年第 1 期。

[11] 《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下，《道藏》第 6 册，文物出版社等 1988 年，第 338—340 页。

[12] 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六《三皇文序目》，《道藏》第 22 册，文物出版社等 1988 年，第 35 页。

[13] 刘仲宇：《〈三皇文〉新探》，《中国道教》1993 年第 2 期。

[14] a. 同 [13] ; b. 同 [8] b。

[15]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上,《道藏》第 1 册,文物出版社等 1988 年,第 774—783 页。

[16] 同 [8] b。

[17] 同 [8] b。

[18] 王育成:《唐宋道教秘篆文释例》,《中国历史文物》1991 年第 6 期。

[19] 同 [1] a。

[20] 同 [15] 。

[21] 同 [8] b。

[22] 《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上《东方九炁青天真文赤书玉诀》,《道藏》第 6 册,文物出版社等 1988 年,第 186 页。

[23] 原文为“赤帝”,当为抄录之误,笔者据前后文修改。

[24] 《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上《元始五老镇灵求仙禳灾赤书玉诀》,《道藏》第 6 册,文物出版社等 1988 年,第 193 页。

[25] 张全民:《〈唐故普康公主墓志铭〉与道教五方真文镇墓石》,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六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234—244 页。

[26] 刘卫鹏:《“五石”镇墓说》,《文博》2001 年第 3 期。